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湖湘文化 与 巴蜀文化

主编 朱汉民

湘学的源流与学统

巴蜀学术源流史话略

巫山考

湖湘巫风溯源

巫风楚雨中的湘西世界

王夫之的西晋诗歌批评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

综论汉代巴蜀文学三杰与《文心雕龙》

廖平《乐经》凡例疏证

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

楚风蜀韵是中华文化中富于创造性的姊妹花

湖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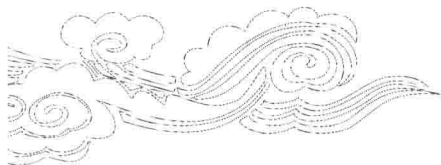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湖湘文化 与 巴蜀文化

主编 朱汉民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首届高层论坛”论文选集。共分“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的关系”三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朱汉民主编.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667 - 0492 - 4

I. ①湖… II. ①朱… III. ①文化史—湖南省—文集
②文化史—四川省—文集 IV. ①K296.4 - 53 ②K297.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203号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

HUXIANG WENHUA YU BASHU WENHUA

作 者: 朱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校对: 全 健 责任印制: 陈 燕

特约编辑: 蓝甲云 高 丽 卢付林

印 装: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张: 31.25 字数: 578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0492 - 4/K · 84

定 价: 98.00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ls@hnu.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主 编：朱汉民

目次

第一辑 湖湘文化

湘学的源流与学统 朱汉民·····	3
湖湘巫风溯源 王 勇·····	15
张栻对胡宏思想的传承及调整 钟雅琼·····	23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邓洪波·····	33
王夫之的西晋诗歌批评 曾 毅·····	48
王船山的军事思想及其对近代湖南历史人物的影响 罗玉明 刘建辉·····	55
重评曾国藩 王继平·····	68
湘军主帅对川籍名将鲍超的关爱和栽培 王兴国·····	91
皮锡瑞的《王制》研究评析 吴仰湘·····	105
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 潘 斌·····	136
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陈先初·····	144
湖湘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殷 慧·····	156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及其深远影响 彭大成 周树辉·····	162
从“尽义务”到“享权利”——以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四女杰为中心的 考察 万琼华·····	174
巫风楚雨中的湘西世界——论现代湖南作家沈从文写作中的楚巫文化因素 涂 鸿·····	183

第二辑 巴蜀文化

巴蜀学术源流史述略 舒大刚·····	193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舒大刚·····	208
从民族文化与道教文化对李白郭沫若影响看巴蜀区域文化特质 徐希平·····	225

巫山考 杨铭	241
巴蜀历史人物地理分布研究——以正史、总志入传人物为考察对象 王小红	252
巴蜀遗产廊道对中华文化交流的贡献初探 黄文	262
关于巴蜀文献整理的思考 张尚英	270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彭华	279
汉代巴蜀文学三杰与《文心雕龙》 王万洪	298
蜀学大儒苏轼张栻对少数民族的儒学影响 杨翰卿	332
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 李冬梅	338
水网天下，神通川湘：四川杨四将军信仰的分布及意义 郭建勋	348
川僧无准师范生平考 黄锦君	361
廖平《〈乐经〉凡例》疏证 田君	373
《周礼折衷》学术价值初探 郭齐	399
刘咸忻对鲁滨逊《新史学》的反思——刘咸忻《〈文史通义〉识语·较新》 篇研究 钱永生 倪姝	410

第三辑 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的关系

试论区域文化精神研究的基本原则——以湖湘文化精神研究为例 李清良	425
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 贾剑秋	432
晚清蜀学与湘学的交流与互动——以何绍基、吕调阳为考察对象 霞绍晖	442
宋代巴蜀、湖湘地域的书院教育评述 李文泽	454
楚风蜀韵是中华文化中富于创造性的姊妹花 祁和晖	476
廖平和王闿运学术异同考 吴龙灿	482
后记	492



第一辑 湖湘文化

湘学的源流与学统

朱汉民

湘学即湖湘传统学术，是中国丰富多彩的区域性传统学术形态中的重要一支。湘学经历了一个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并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湘学研究的历史也已很久，早在南宋湖湘学术兴盛之时，湘学就开始成为学界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与话题，并留下许多的文献与论著。由于湘学历史长，学派、人物和著作众多，研究者较多采取对湘学具体人物及其学派的研究，而较少对湘学作综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将它与中国传统学术关系作总体把握。

本文主要讨论湘学的源流与学统问题，我们首先探讨湘学史的演变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考察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并展开对湘学的综合性研究与思考。

一、湘学的渊源

湘学是什么？此“湘”是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学术，此“学”是指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所以，学界一般是以两宋时期的周敦颐、胡氏父子作为湘学的开端。他们的学术是湘人之学或产生于湘地之学，同时也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

但是，由两宋时期的湘学还可以进一步上溯。晚清一些学者就强调湘学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他们认为可上溯到先秦时期。戴德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①他以屈原为湘学的宗主。叶德辉则进一步提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

^① 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

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①

应该说，我们把周敦颐作为湘学的奠基人、宗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宋代一些著名学者早有此观点。但是，把屈原甚至鬻熊作为湘学的“大宗”，则有进一步考究的必要。

首先，叶德辉以湘学“肇于鬻熊”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鬻熊是楚国的开拓者，后来还留传《鬻子》一书，但这部书于何时成书，至今还是个疑问，而且鬻熊只是楚国的创始人，而湖南至战国初才纳入楚国版图，所以鬻熊与湖南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屈原则不相同。他在流放湖南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观念，并对以后的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相继又有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批学者流放或寓居湖南，在此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因此，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是与“湘学”有关联的。

那么，屈、贾、柳、刘等人的学术思想在“湘学”的脉络中应该如何定位？

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屈、贾、柳、刘等士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形成、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因而能够纳入到湘学的脉络中来。屈原在沅湘之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包括《九歌》、《九章》、《天问》、《渔父》、《招魂》等篇章，这些作品大量吸取了沅湘地区文化中的自然观念、宗教思想、社会理念、人生哲学、艺术思想等。当后来的文人学者从屈原的诗歌中考察楚人关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宗教、自然的认知时，这些体现楚人的观念形态无疑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贾谊的知识学问也是如此，尽管贾谊是中原地区的才子，年少时即“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他寓居长沙期间，主要是将中原的知识学问传播到湖南地区来。但是，他在寓居湖南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仍有很突出的地方性知识特点。一方面，他在湖南期间写了《吊屈原赋》、《鹏鸟赋》这些具有鲜明地域性特色的诗赋，尽管诗赋主要是表达主观的情感世界，但其中仍反映出一个中原士大夫流放到湖南这个独特自然、文化环境下的思想观念，包括对自然天道、社会政治、人间善恶的知识与观念，其中的《吊屈原赋》还体现出贾谊在思想上、情感上对屈原的传承，这也是地域性知识观念的特点。另一方面，他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一些重要上疏，如《谏铸钱疏》、《阶级》等文亦反映了一个在湖南这个皇权边缘地区的士大夫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独特见解。

^① 叶德辉：《郅园书札·答人书》

其次，我们也应该指出，屈、贾所留下的著述，还不是标准的湘学形态，因而就更谈不上湘学学统的开创者。一方面，湘学之“学”首先是指学理化的知识系统，而屈、贾所留下的著述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并非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即非标准的“学”。另一方面，湘学之“湘”作为一个政区的符号，以及与政区相关的文化区符号，能得到普遍公认也是到较晚之后，屈原的作品向来是被纳入到另一个区域文化——楚文化即楚学系统之中。由于上述原因，屈、贾的作品既然不是标准的学，也就不可能构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传承的“学统”。

由此可见，在湘学和湘学学统的脉络中，屈、贾等人的著述及思想应该属于“渊源”的性质，而并非湘学之“大宗”或成型的形态（叶德辉认为湘学“成于三闾”）。这样就可以明确屈、贾等人在湘学脉络中的定位，即我们肯定屈原、贾谊等流寓湖湘的文人学者给这块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湖湘带来了以文字、书籍为载体的各种知识与观念，这些知识、观念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并对后来的文人学者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应该将它们纳入到湘学学统的脉络中来，将其看作是湘学的源头。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屈原等人在湖南地区留下的著述还不是真正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思想，更没有形成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学派、学统，所以不能将屈原、贾谊的著述看作是成型的湘学形态。

二、湘学的成型

我们一直认为，湘学作为一种区域学术形态出现于学术文化界，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中华学术文化的重大发展、转型密切相关。学术界已经公认，从中晚唐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演变与转型，包括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学术文化下移导致的地域化儒学形态的繁荣，中华文化重心南移而导致的江南文化教育的发达等等。正是在这一重大的文化变革中，地域化的湘学形态得以成型。

一般认为，完全成型的湘学形态是南宋湖湘学派。确实，在湘学史上，最早以独立的区域的学术形态活跃于学术界，并获得相关命名的是南宋胡氏父子和张栻。在儒学区域形态十分成熟的两宋时期，胡、张创建的儒学学派被朱熹称为“湖湘学”或“湖南学”。而总结宋元学术史的大家全祖望说：“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①全祖望引吕祖谦之语从而肯定了胡五峰的学术成就，并充分肯定了他

^① 《宋元学案》卷一二，《五峰学案》，全祖望案语。

“开湖湘之学统”的地位。但是，湖湘学派的出现是唐宋之际中国学术文化发生重大演变与转型的成果之一。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唐宋转型”以来在湖南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者，我们就要从胡、张的湖湘学而进一步上溯至北宋的周濂溪，并进一步由北宋的周濂溪上溯至晚唐的柳宗元。柳宗元——周敦颐——胡、张的湘学构成的学术脉络，既能够充分展现唐中叶以来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基本进程与发展脉络，即晚唐的儒学复兴（柳宗元）、北宋的新儒学奠基（周敦颐）、南宋的新儒学集大成（胡宏、张栻）。同时，这一学术又主要是在向来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湖湘地域衍化、发展出来的，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

下面，我们分三个阶段来讨论湘学成型的问题。

第一阶段，中唐以后的儒家复兴时期，以柳宗元为代表。学界均肯定，宋代新儒学思潮应该追溯至八、九世纪之交的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古文运动”，推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但是，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其新的学术思想与湖湘地域的关系，注意到其学术思想的地域性背景。唐宋之际的新儒学运动，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个人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因而地域性是其重要特点。而柳宗元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论著，均是在偏僻的湖南永州地区完成的，他是唐宋以来很早从事地域性儒学建构的儒学学者。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陈弱水先生认为，柳宗元“在永州放逐的十年，是他一生唯一致力于学思写作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他在知识界的声誉日隆；虽然身处南荒，也有不少青年士子远来求教”。^①毫无疑问，柳宗元在湖南的十年治学、讲学活动，对湖湘地区的儒学建构与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致力于“言道、讲古、穷文辞”的活动不仅具有地域学统的建设意义，同时也大大推动了中唐以后中华大地的儒学复兴运动。所以，我们可以将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领袖人物柳宗元作为湘学的先驱者。

第二阶段，北宋理学创建，以周敦颐为代表。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只是倡导复兴儒学，但是，儒学要复兴则必须完成重建工作，作为理学宗师的周敦颐则是这一儒学重建的开山祖。周敦颐之所以被称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学术体系的原因，周敦颐留下了《太极图谱》、《通书》等著作，为儒家创建了既可统一意识形态，又可安身立命的身心性命之学；其二，学术授受原因，二程从学周敦颐后，成为理学的奠基人，四传而至朱熹。南宋以后，周敦颐受到后学前所未有的推崇，正如《宋史·道学传》所说：

^①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0—251页。

“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①周敦颐不仅是理学的开山祖，也是湘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是湖南道县人，在濂溪故里出生长大，尽管他十五岁后离开湖南去了开封，但他在中年时期先后至湖南的郴州、邵州做官，同时研究、传播学问。他创建了宋代重要地域性学派之一的濂学，“濂”就是取他故乡“濂溪”之名而来。周敦颐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南宋湖湘学派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后来讨论湘学的学者，均是将周敦颐列为湘学的重要学者，或作为湘学的奠基人。

第三阶段，南宋理学的集大成阶段，出现一大批湘学学者，其中尤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从学统授受而言，胡、张均是二程之学的传人，而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故而也是濂学学统的承传者。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大多不是湖南人，胡安国、胡寅、胡宏一家是福建人，张栻是四川人。但是，由于他们的主要学术活动、形成学派皆是在湖南，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湖湘学派。最早为此学派命名的不是别人，而是和他们有密切交往的朱熹。朱熹经常和弟子们评论胡安国父子、张栻及其弟子的理学思想，并将他们统称为“湖湘学者”、“湖南学”、“湖南一派”等等。据《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答湖湘学者书“以爱字言仁”如何？^②

因论湖湘学者崇尚《知言》。^③

因说湖南学先体察。^④

湖南一派，譬如灯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⑤

可见，还是在南宋初，湖湘学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而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朱熹所提出的“湖湘学”或“湖南一派”的命名，得到了后世的一些学术史家的进一步肯定和沿袭。黄宗羲、全祖望在编纂学术史名著《宋元学案》时肯定并沿袭了朱熹的“湖湘学”称谓。黄宗羲在《武夷学案》黎明传中，有“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指黎明）最有功焉”之说，明确了“湖湘学派”的命名。在《南轩学案》中，黄宗羲还有“湖湘一派，当时为最盛”的说法，即沿袭朱熹“湖南一派”的说法。全祖望为《五峰学案》作案语时，提出“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派”。他们均肯定了湖

① 《宋史·道学传》。

② 《性理三》，《朱子语类》卷六。

③ 《程子门人》，《朱子语类》卷一〇一。

④ 《程子门人》，《朱子语类》卷一〇一。

⑤ 《程子门人》，《朱子语类》卷一〇一。

湘学派在理学史上的存在及其历史影响。在湘学史上，湖湘学派最为显著的有两点。其一，这是一个著名学者的群体，不仅著名理学家多，代表性学术著作也很多，包括胡安国的《春秋传》、胡宏的《知言》、张栻的《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易说》等；其二，这个学派首次以“湖湘学”、“湖南学”，“湖南一派”的地域性学派的名称流行于当时及以后的学术界。所以，黄宗羲在总结宋元学术史时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①正由于南宋湖湘学派具有上述特点，许多学术史家就直接以湖湘学派为湘学学统的奠基者，如全祖望就认为胡宏“开湖湘之学统”。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三个阶段的关系呢？我们似乎应该将湘学的成型纳入到唐宋时期学术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之中，因为区域学术形态的成型是与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唐宋学术文化的总体趋势是由来自民间的儒学复兴到新儒学的创建和完善，柳宗元、周敦颐和胡、张湖湘学的演变正体现了唐宋时期中华学术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其实，这也是湘学形态从肇始到奠基、成熟的过程。一般而言，后来学者均肯定了周敦颐、胡氏父子、张栻在湘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如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在概括宋代的湖湘学术源流时，以周敦颐之学为首，以胡安国、胡致堂、胡五峰为中，以张栻及朱熹为近，来表达湖湘学术“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及”^②的繁盛。应该说，真德秀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说法受当时的“道统”说影响较大，故而仅将湖湘学统追溯至道学开山祖周敦颐。如果能够超越道统论的限制，则可将眼界进一步放宽，因为柳宗元不仅仅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开拓者，同时，他主要是在湖南永州从事学术教育活动，特别是他的学术旨趣与以后的湖湘学者的学术旨趣有着十分相似的特点。

三、湘学的发展

如果说楚汉是湘学的渊源，唐宋是湘学的成型，那么，从明清到民国初则是湘学的大发展时期。清代湘学发展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湘学学者本土化的全面完成。从楚汉到唐宋，能够在湖湘大地留下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学术著作的，基本上以外来寓居湖南的士大夫、文人学者为主体。无论是楚汉时期的屈原、贾谊，还是唐宋时期的柳宗元、刘禹锡、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浚张栻父子、真德秀、魏了翁等等，他们均是寓居、流放于湖湘之地的外来学者，周敦

^① 《宋元学案》卷五〇，《南宋学案》，黄宗羲案语。

^② 《真西山集》卷七，《劝学文》。

顾是少有的例外，可他十五岁即离开湖南赴开封，后来回湖南做官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明清以来，湖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知名学者，推动了湘学发展到罕见的高峰，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明清时期的湘学学者均是湖湘本地人，其中大多数又主要是在湖南接受教育、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他们的教育背景、学术背景具有更加鲜明的湖湘地域性色彩。譬如，宋以后湖南教育开始发展，书院教育尤其发达，故推动了湘学本土化的完成。明清时期的湘学学者大多在湘学学统特别坚实、湘学学风十分浓厚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接受教育，这些书院的山长、主讲都有强烈的承传、弘扬湘学学统的学术理想，湖湘学人就是在这种学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加之这些学人相互之间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学术交往和影响，从而使得明清时期本土的湖湘学人迅速成长壮大，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一支很有学术实力的群体。

明清以来湘学成熟与发展的第二个显著标志，就是这段时期湖湘地区高水平的学者、学派、论著等在规模、数量上大幅度地增加，特别是晚清至民国初期，呈现群星灿烂的局面。明清之际王夫之是当时的三大儒之一，但其学术的深度与广度，则在顾炎武和黄宗羲之上。清初刘献廷读了船山的部分著作后指出，王夫之“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①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船山之学代表了湖湘之地的“圣贤学脉”，并已经达到“无所不窥”、“《六经》皆有发明”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湖湘之地学术不盛，“仅此一线”。他说此话是在清康熙年间，而到了清道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出现的今文经学派以魏源为首、理学经世派以曾国藩为首，特别是光绪以后的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大批新学学者、学术成果，使湖湘地区的学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这些诸多的学人、学派、学术思潮有着非常不同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但是，他们之间都表现出共同的湘学学统及其学术旨趣。

明清以后湘学发展的第三个显著标志，就是这些本土学者能够根据历史演变、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从而成为引领新兴学术思潮的代表。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最为急剧的时期，同时也是学术思潮变革最为显著的时期。只有走在时代前面的学人，才能够预见社会的发展趋势，继而创造新的知识与思想，从而引领学术思潮的变革。清朝、民国初年的湘学能够大显于天下，为近代学人所推崇，实由于湘学在与时俱进中引领着不断演变、发展的学术思潮。如明清之际的社会剧变中产生了一种反省传统文化的人

^① 刘献远：《广阳杂记》，《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519页。

文主义思潮（有学者称“启蒙思潮”），而王船山作为湘学的杰出代表，就是这一人文主义思潮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不仅系统地吸收、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又根据历史发展的需求，从经学、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各个知识领域，做了合乎新时代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创发。清代道光以后，中国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从知识领域作出新的创发，走上民族自强、人民幸福的道路？湘学在这个时期表现得尤为精彩。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表现出对一种新知识的呼唤，他的《海国图志》更是全面拓展了中国知识界的眼界，更新了知识结构。此后，中国知识界不断演进发展，并产生许多新的学术思潮，其中均有湘学代表人物走在前列。

近代以来，湘学走向发展与成熟，但同时也面临一种区域学术形态的解体，这似乎体现出“物壮则死”的生存辩证法。其实，湖湘区域学术形态的产生，本是传统儒学地域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地方性知识形态的体现。但是，中国近代化过程首先是文化观念与知识形态的近代化，而这种新的知识形态其实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按西方知识学分类的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两类知识形态均是以西方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为背景而完成的知识建构。民国以后当湖南的学者渐渐成为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学者，如杨昌济、李石岑、谭戒浦、金岳霖成为哲学专家学者，杨树达、余嘉锡、黎锦熙成为语言文字学专家学者，李剑龙、陈衡哲、向达等成为历史学专家学者，还有更多的是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各种工程技术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学术成就体现出湖南学人对中华乃至人类学术文化的贡献，但是，他们所形成的学术成果的地域性文化背景、区域学术传统的意义越来越淡薄，而它们作为专业性、普适性的知识形态的特点则日益明显。

在民国时期的专家学者中，那些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形态与“湘学传统”没有多少关联；同样，那些从事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形态，与“湘学传统”的联系也比较少，当然，这些湖南学人的内心深处可能仍有湘学旨趣的影响，这些应用科学与传统经世之学有一些联系。相对而言，那些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形态，天然地与传统湘学有比较多的联系，无论是学术形态，还是学术旨趣，均受湘学传统影响较大，可以将其看作近代化以后转型中的湘学形态。

这里以杨昌济为例。杨昌济于光绪年间就读于岳麓书院，深受湘学学统的影响。民国初年，他又留学日本、英国，学习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其学术思想又获得西方知识学的洗礼。因此，他回国后从事学术研究、高等教育时，其学术形态既有传统湘学的特点，又有西方哲学的背景。特别是其学术旨趣、教

育理念，则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湘学学统的特点。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留下的《讲堂录》中，记载有杨昌济的讲课内容。从这些原始的课堂笔记中可以发现，杨昌济的学术旨趣、教育理念体现了湘学学统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以湖湘理学传统思想学术的代表人物，包括宋代的周敦颐、朱熹、张栻，明清以来的王船山、曾国藩的学术理念传授学生；另一方面，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也体现出浓厚的湘学旨趣，如他强调“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度之理”、“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不豪杰者也”。^① 这些言论均体现出鲜明的湘学旨趣特色。至于其伦理学及哲学学术形态，更是体现出湖湘理学的历史影响。

四、湘学学统的建构

我们对湖湘学术源流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历代学人为什么将他们统称为“湘学”？仅仅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学术、思想均产生于“湘”这个特有的空间，还是这一系列学术思想有着前后贯通的知识传统？

事实上，湘学学统的形成，与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有关。宋学初兴之时，各个地域开创了自己的学统，全祖望曾经提出“庆历之际，学统四起”，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学统的地域化形态初起的状况。宋代以来的学术界大兴“学统”，并且主要呈现为地域化学术形态，这与宋代以来的学术创造、学术授受的方式有关。两汉也是儒学大盛的历史时期，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是在中央皇朝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运动中产生的，五经博士的设置、太学的经学传授是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方式，经学的研究、传播依赖于那些由朝廷供养的经师们的“家法”、“师法”。而宋代儒学的大兴则是儒家士大夫从民间讲学开始的一种学术活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其家乡或寓居之地，独立自主地从事知识创新的学术活动，同时从事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讲学活动。所以，宋明以来，学术史上出现一个十分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就是大量地域性学统的出现。全祖望在研究、整理宋以后的学术史时，就大量使用这种地域性学统的命名，包括“浙中学统”、“湖湘学统”、“婺中学统”、“甬上学统”、“粤中学统”、“横渠学统”^② 等等，这些学统大多是宋代奠定，并沿续到明清时期。

但是，“学统”这个概念本来就包含着学术传统与学术正统的双重含义。

^① 《毛泽东早期文物》，《讲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5、531页。

^② 参阅《宋元学案》、《鲇埼亭集》等。